

斯 大 林
問 題 與 答 覆



053

斯 大 林

問 題 與 答 覆

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在
斯維德洛夫大學的演說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1511

斯大林
問題與答覆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32,000
印數：1—20,000

一九五四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И. В. СТАЛИН

ВСПРОСЫ И ОТВЕТЫ

本書譯文以東北新華書店一九四九年出版的「斯大林選集」第一卷中的「問題與答覆」一文為基礎，根據「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的原文校訂了一次。

CAB 23/10

問題與答覆

——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在斯維德洛夫大學的演說

同志們！我來回答你們用書面提出的問題。我就依照你們所排列的次序，來逐一回答。這些問題，你們都知道，一共有十個。

現在我們從第一個問題開始。

一

麼辦。在將來十年至十五年中，如果蘇聯得不到西方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支持，需要些什麼法和什麼條件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合？

我以爲這個問題已包括了你們用書面提出來的一切其餘問題。所以我的答覆帶有一

般的、因而遠不能詳盡無遺的性質。不然在回答其餘問題時，就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我以爲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的決議，可以給這個問題以詳盡的答覆。這些決議說：

對農民的正确政策是鞏固聯合的主要保證。

但是什麼是對農民的正确政策呢？

這個政策只能由經濟、行政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足以保證鞏固聯合的許多措施組成。

現在我們先從經濟方面講起。

首先，必須消滅農村中戰時共產主義的殘餘。其次，必須對工業品及農產品的價格有正確的政策，以保證工業與農業的迅速發展，並消滅「剪刀差」。此外，必須減低農業稅的總額，並逐漸使農業稅從全國預算的軌道轉上地方預算的軌道。必須使千百萬農民羣衆合作化，首先是在農業合作社及信貸合作社方面合作化，——合作化是使農民經濟加入社會主義建設總體系裏去的手段。必須盡可能地以拖拉機供應農村，這是使農業技術革命化的手段，也是在農村中創立文化技術基地的方法。最後，必須實行電氣化的計劃，這是使農村和城市接近，並消滅它們之間的對立的方法。

黨如果要保證城市和農村在經濟方面的聯合，這就是它應該走的一條道路。

我想使你們注意農業稅由全國預算軌道轉上地方預算軌道的問題。這或許會使你們驚奇。但是，農業稅現在就帶着、並且將經常帶着地方稅的性質，這是事實。例如，大家都知道，兩年以前農業稅佔我們國家預算收入項下主要的、或差不多是主要的部分。可是現在呢？現在它僅佔國家預算的極小的一部分。國家預算現在是二十五億盧布，而農業稅在今年至多可供給二億五千萬至二億六千萬盧布，比去年的總額要少一億盧布。可見，數目已經不是那麼多了。並且國家預算越是增多，其中農業稅部分也就越要減少。其次，這二億六千萬盧布農業稅中的一億盧布將歸入地方預算裏去。這個數目比全部農業稅的三分之一還多。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在現有一切稅收中，農業稅最接近於地方條件，最適合於地方需要之用。地方預算將來總要增加，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地方預算的增加，首先要依靠最適合於地方條件需要的農業稅，這也是毫無疑義的。國家收入的重心，現在已經轉到並且將來也總要轉到另外一種收入上去，即轉到國營企業的收入上去、轉到間接稅等等上去，這是尤其可能的。

因此，把農業稅由國家預算的軌道轉上地方預算的軌道，在一定的時候是可能的，

並且從鞏固聯合的觀點看來，是完全適當的。

現在我們來談行政政治方面保證聯合的措施。

在都市和農村中培植蘇維埃民主，並振興各級蘇維埃，使國家機關精簡起來和在道德上健全起來，把官僚主義分子及資產階級腐朽分子從這種機關中驅逐出去，使國家機關和千百萬羣衆充分地接近起來，——如果黨要在行政和政治建設方面鞏固聯合，這就是它應該走的一條道路。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最後目的。專政乃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手段與道路。那末什麼是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是由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向無國家的社會的過渡。但是爲了實現這種過渡，就必須依照這樣的方向和用這樣的辦法來準備改造國家機關，就是藉助這個方向和這種辦法能够在實際上保證由專政的社會轉變爲共產主義社會。振興各級蘇維埃的口號、在都市和農村中培植蘇維埃民主的口號，及吸收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的優秀分子直接管理國家的口號，都是爲了這個目的而提出來的。改善國家機關，認真地改造它，把官僚主義分子和腐化分子從國家機關中驅逐出去，使國家機關與廣大羣衆接近和親密起來，——所有這一切，如果沒有羣衆本身對國家機關經常的和積極的幫助，是不可能

的。但是，如果沒有把工人和農民中的優秀分子吸收到管理機關中來，如果沒有實現國家機關和最「下層」勞動羣衆的直接聯系，那末雖有羣衆積極的和不斷的幫助，也是不可能的。

蘇維埃國家機關和資產階級國家機關有什麼差別呢？

首先就是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是站在羣衆上面的，因此它與居民之間被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壘所隔開，而就它的本質來說，是與人民羣衆漠不相關的。但是蘇維埃國家機關是和羣衆打成一片的，因為它如果要保持自己真正是蘇維埃的國家機關，就不能而且也不應當站在羣衆上面；因為如果它要真正掌握千百萬勞動羣衆，它就不能與這些羣衆漠不相關。這就是蘇維埃國家機關與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原則性的差別之一。

列寧以前曾經在他的「布爾什維克能否保持國家政權？」中說過：布爾什維克黨的二十四萬黨員，毫無疑義地能夠爲窮人的利益反對富豪而管理國家的，因為他們決不會比爲富豪的利益反對窮人而管理過國家的十三萬地主壞些。因此，有些共產黨員根據這個理由就以爲國家機關只要幾十萬黨員就夠了，他們完全足以管理巨大的國家了。他們有時就這樣地想把黨和國家等同起來。同志們，這是錯誤的。這是曲解了列寧的意

思。列寧在說到布爾什維克黨的二十四萬黨員時，決不是想說，蘇維埃國家機關的成員和總規模僅僅限於或可以限於這些黨員。恰恰相反，除黨員而外，他還把在十月革命前投票贊成布爾什維克的一百萬人也加入國家機關的成員裏去，他說，我們有方法一下子使我們的國家機關增加十倍，就是用吸收勞動者到管理國家的日常工作中來的方法，至少使國家機關增加到一千萬人。

列寧說道：「這二十四萬人，現在已經有不下於一百萬擁護自己的成年人了，因為歐洲的經驗和俄國的經驗，例如彼得格勒杜馬的八月選舉所確定的，正是這樣的黨員數目與投票贊成黨的人的數目的對比。所以我們已經有一百萬人的『國家機關』，這些人是在思想上忠於社會主義國家的，而並不是爲了在每月二十號領一大筆錢的。」

而且，我們還有『不可思議的方法』，立刻一下子使我們的國家機關增加十倍，這是一種從來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有過而且也不可能有的方法。這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就是吸收勞動者、吸收貧民到管理國家的日常工作中來」（見『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一卷，第二六四——二六五頁）。

但「吸收勞動者、吸收貧民到管理國家的日常工作中來」，是怎樣進行的呢？

這種工作是通過在蘇維埃、經濟機關、工廠委員會、文化機關、黨組織、青年團組織、各種合作社組合等等周圍形成起來的首倡性的羣衆組織，一切委員會，評議會和代表大會來進行的。我們的同志們有時不注意在我們下級黨的、蘇維埃的、文化的、職工會的、教育的、青年團的、軍隊的、婦女部的及一切其他組織的周圍，有許多擁有千百萬非黨的工農羣衆自己發起的組織、委員會和評議會等的一大堆組織在忙碌着，那在日常的、看不出的、麻煩的、不聲不響的工作中創造了蘇維埃的基礎和生命、蘇維埃國家力量的泉源的一大堆組織在忙碌着。沒有這些圍繞着我們蘇維埃機關和黨機關的千百萬組織，蘇維埃政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領導和管理這個大國，是絕對不可能的。蘇維埃國家機關不僅僅是由蘇維埃組成的。蘇維埃國家機關，就其深刻的意義來說，是由蘇維埃加上千百萬一切非黨的與黨的團體的組織組成的；這些團體把蘇維埃和最深的「下層」連接起來，使國家機關與千百萬羣衆打成一片，並且逐步消滅國家機關與居民間的任何類似壁壘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應該如何努力把國家機關「增加十倍」，使它與千百萬勞動羣衆親密和接近，把官僚主義殘餘驅逐出去，與羣衆打成一片，從而準備由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過渡

到共產主義社會。

這就是振興蘇維埃和培植蘇維埃民主這一口號的意義。

這就是黨在行政政治工作方面所必須的鞏固聯合的主要措施。

至於說到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保證聯合的措施，那是用不着多說的，因為這些措施很清楚，大家都知道，所以不需要解釋。我只想指出最近時期在這方面工作的基本路線。

這一基本路線就是要準備在全國、在全蘇聯實行普遍的初等義務教育所必需的條件。同志們，這是最巨大的改革。實行這種改革，將不僅是文化戰綫上的，而且也將是政治戰綫和經濟戰綫上的最偉大的勝利。這種改革必然會成爲使國家大大興盛的基礎。但是，這種改革要花費數億盧布。只要指出這一點就夠了，就是要實行這種改革，需要差不多五十萬男女教師底整個大軍。雖然如此，但是我們如果真正想把我國提高到最高的文化程度上，那我們就必須保證在最近時期實行這種改革。同志們，我們就要做這一工作。這是不容懷疑的。

這就是我對你們第一個問題的答覆。

現在我們來談第二個問題。

二

如果資本主義的穩定會長久保持下去，我們黨由於這種穩定會有哪些蛻化的危險？一般說來，我們有沒有這樣的危險呢？

這種可能的和甚至現實的危險，無疑地是存在着的。但是這些危險的存在，與資本主義的穩定無關。資本主義穩定僅僅使其更加顯著而已。我以為如果拿這些危險中的主要危險來說，它們有下列三種：

- (一) 對我國建設事業失去社會主義前途的危險，因而產生取消主義；
- (二) 失去國際革命前途的危險，因而產生民族主義；
- (三) 降低黨的領導的危險，因而可能使黨變為國家機關的附屬物。

我們先談第一種危險。

這種危險的特點是不相信我國革命的內部力量；不相信工農聯盟事業；不相信工人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不相信由「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變為「社會主義的俄

羅斯」的事業；不相信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能獲得勝利。

這是一條取消主義和蛻化的道路，因為它會引起取消十月革命的原則和目的，會使無產階級國家蛻化爲資產階級民主制國家。

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在我們國民經濟內部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作殊死鬥爭的條件下，資產階級對黨的影響的加強就是黨內這種「意向」的來源及其發生的基礎。資本主義分子不僅在經濟方面進行鬥爭。他們並且力圖轉入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方面作鬥爭，企圖用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懷疑我國建設工作的社會主義前途，來傳染黨內最不穩定的隊伍；而且不能說，他們的努力始終絕對沒有效果。

一些受到這種傳染的「共產黨員」說：「我們落後國家，哪裏去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國的生產力狀況使我們不能抱類似空想的目的，謝天謝地，讓我們勉勉強強支持下去吧，不管我們達到達不到社會主義，我們來建設吧，以後就會看出……」。

另一些則說：「我們已經完成了自己革命的使命，完成了十月革命，現在一切都要靠國際革命，因為如果沒有西方無產階級先期的勝利，我們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嚴格地說，俄國的革命者已不再有什麼事可幹了……」。大家都知道，在一九二三年，德國革命

的前夕，我國一部分青年學生準備拋開書本，到德國去，他們說：「俄國的革命者已無事可幹，應當拋開書本，到德國去作革命工作」。

可見，這兩類「共產黨員」，無論是第一類或者是第二類，都是站在否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可能性的立場上和取消主義的立場上的。他們之間的差別就在於：第一類人以「科學的」「生產力理論」來掩蓋自己的取消主義（難怪前幾天米留可夫讚揚他們，在「最近新聞」上稱之為「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第二類人則用左的和「非常革命的」「世界革命的詞句來掩蓋這種取消主義」。

實際上，假如說革命者在俄國已無事可幹；假如說當社會主義在其他國家獲得勝利以前，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思議的和不可能的；假如說社會主義在先進國家獲得勝利還要拖延十年至二十年，那末，在這樣一些條件下，能不能設想，我們經濟中那些在資本主義包圍我國的情況下活動着的資本主義成分，會同意停止與我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作殊死鬥爭，並且會袖手等待世界革命獲得勝利呢？爲了認清這種假設之荒謬絕倫，值得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但是，如果撇開了這種假設，那末我國「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和「非常的革命家」還有什麼可幹的呢？顯然，他們可幹的只有一件事：就是

空忙，屈服於自發勢力的意志，並逐漸蛻化爲尋常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們認爲我國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地，如列寧所說的，擁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資料，那末我們能够而且必須指望完全戰勝我們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來建設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或者我們不把我國當作革命基地，我國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資料，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那末，如果社會主義在其他國家獲得勝利遲延時，我們就必須容許我們國民經濟中資本主義成分佔優勢，蘇維埃政權瓦解，黨蛻化。

或者是前者，或者是後者。

所以不相信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就會導致取消主義和蛻化。

所以與取消主義的危險作鬥爭，是我黨的當前任務，尤其是在現在、尤其是在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情況下。

現在我們來談第二種危險。

這種危險的特點，是不相信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不相信它能獲得勝利；懷疑殖民地 and 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不了解：我國如果沒有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的支持，便不能

抵擋世界帝國主義；不了解：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不可能是最後的勝利，因為如果革命還沒有在許多國家內獲得勝利，它便不可能保證不受武裝干涉；不了解國際主義的這一基本要求：即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並不是最後目的，而是用來發展和支持其他國家裏的革命的手段。

這是一條民族主義與蛻化的道路，是一條完全取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政策的道路，因為患了這種病的人，把我國看成不是整個的、稱為世界革命運動的一部分，而是這一運動的起點和終點，認為一切其他國家的利益應當為我國的利益而犧牲。

要支持中國的解放運動麼？為什麼要支持呢？不會有危險麼？這不會使我們與其他國家發生糾紛嗎？我們和其他「先進的」列強一塊兒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而從中國取得某種有利於自己的東西，豈不更好麼？這樣做既有好處，又無危險……要支持德國的解放運動麼？值不值得冒這個危險呢？同意協約國的凡爾賽和約，而以賠償費的形式獲得一些利益，豈不更好麼？……要不要和波斯、土耳其、阿富汗保持友好呢？值不值得這樣作呢？同一些列強一起恢復「勢力範圍」，豈不更好麼？等等。

這就是企圖取消十月革命的對外政策和培養蛻化分子的新式民族主義的「意向」。